

徐州文史资料



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徐 州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七年十月

目 录

徐州地区人民公社化运动梗概·····	蔡承贤(1)
难忘华山岁月·····	周嵩山(10)
我劳动在大炼钢铁中·····	郭景山(31)
记述铜山县解放初期的税种开征和财政体制 ·····	马鸣远(45)
话说银行唱戏·····	王理中(47)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徐州小学生·····	李世明(51)
两岸情谊心相印 ——台湾丰县同乡会理事长、聘之表兄故乡行纪实 ·····	徐敦民(59)
同盟会创建者之一、革命先驱程家桢·····	程惠婉(64)
刘仁航及其佛学思想的创新·····	曹君乾(82)
记原中央大学两位徐州籍的著名学者周鸿经、郑万钧两 教授·····	谭伯鲁(98)
庄静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程荣华(105)
深深怀念夏岩同志·····	何赋硕 徐振东(114)
一生致力于徐州卫生事业的名医范存德 ·····	王大勤(122)

我跟李可染先生学画的前前后后	孙茂祥(138)
徐州沦陷前的互助储蓄	陈仲言(149)
徐州的育婴堂	陈公恕(154)
山东快书是怎样定名的	王贵增(157)
“戚”改“乔”	金广全(160)
丰县杏树栽培史略	孙启善(162)
最早的记忆	
——解放前生活点滴	高绪基(175)
徐州风土人情散记	耿继信(186)

民主党派史料专栏

徐州民盟建立的经过和初期的活动

.....	莫少彰(209)
徐州民盟创始人江涛声	龚德建(212)
盟史中应有他的名字	
——追忆江涛声同志	权启人(214)
徐州民盟创始人之一莫少彰	余 蒙(218)
徐州民盟创始人之一邹 铎	许惠娟(233)
反右派前后的徐州民盟	徐德修(239)
追忆市民革主委郭任同志	徐德修(248)

徐州地区人民公社化运动梗概

蔡承贤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大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讨论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八届二中全会以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7月,铜山县大庙乡14个高级社、5700多农户合并成立“大庙农场”。邳县徐塘乡也挂出“国营徐塘农场”的牌子。8月中旬,全地区已成立66个乡级规模的农场。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指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在报刊上发表后,全国各地群起仿效,纷纷试办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比八届二中全会还要高的经济

指标,并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一)

1958年8月,办人民公社之风很快吹遍徐州大地,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办农场的积极性转移到了办人民公社上来。中共徐州地委组织各县、市委书记、合作部长、部分乡党委书记去河南省考察学习。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尚未结束,徐州地区第一批人民公社诞生。9月1日,徐州地委通知各县、市委,提出创办人民公社的具体方法、步骤和有关政策。3日,邳县、睢宁两县完成人民公社化。9日,徐州地区历时15天,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66个农场,2631个高级农业社和1595户单干农民组成203个人民公社,入社总农户

1248980 户,占全地区总农户的 99.11% (未加入的还有 3175 户)。

人民公社的规模:1 千户以下 2 个,占 1%;1 千至 3 千户 10 个,占 5%;3 千户至 5 千户 39 个,占 19%;5 千至 7 千户 84 个,占 41%;7 千至 9 千户 42 个,占 21%;9 千至 1 万户 10 个,占 5%;1 万户以上 16 个,占 8%。最大是邳县戴庄、白龙埠、官湖、陈楼、邳城 5 个乡 28076 户组成的“官湖红旗人民公社。”

1958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9 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 15 天里,徐州地区 200 多个乡镇,都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全地区高级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员们带着“申请书”和“决心书”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入会场。有的凌晨 3 点吃饭,提早进入会场。地委、县委每天都要接待成群结队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干部的报喜,鞭炮声连绵不断。

在这个时期内,中共徐州地委和各县、市委,把办人民公社的工作当作唯一的中心任务,成立了“建立人民公社办公室。”抽调 1920 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基层,其中县委正副书记 16 人,正副县长、部长 9 人,乡党委书记、乡长 248 人,一般干部 1647 人。各县、市又抽调 15553 人,组成数百个宣传队,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对极少数人的错误言行进行“重点批判”,促使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

(二)

徐州地区的人民公社组建初期规模大小不一,随后调整为一乡一社、乡社合一,和乡人民政府一套班子、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人民公社党委(即乡党委)设正副书记及委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监委会、共青团委、妇女联合会。公社行政为管理委员会,设正副社长(即正副乡长),下设农村部、水利部、工业部、财贸部、文教卫生部、劳动福利部(沛县称科)和计划委员会。部长及计划委员会主任多由公社副社长兼任。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全公社大权集中,由公社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领导。公社直接经营全社范围的工厂、矿山、企业,统一掌管全社的工业生产和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统一调度全社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统一制订全社的收益分配方案,实行全公社统一盈亏、统一分配。

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一个层次。开始有的地方称管理区,1963年以后,统一称为生产大队。在人民公社初建时,生产大队多以原高级社为基础,规模大小不一。生产大队设管理委员会和中共党支部,领导人为管委会主任(有的称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取消村的建制,生产大队取代行政村的各项职能。大队设共青团支部、妇女、民兵等组织。后在整社中多次调整规模,逐渐形成以自然村为基础,由一村或数村组成。

初期的大队,是由公社授权分片管理本大队的工农

商学兵,帮助生产小队进行经济核算和作物布局,经营人民公社下放的较小的工厂和企业及本大队范围内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管理本大队的小学校,统一规划和调度使用全大队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包括土地)。1959年初,实行“三包一奖”,成为人民公社分片的核算单位,代表公社管委会作为“三包一奖”的发包单位,实行大队统一标准的收益分配。1962年3月,人民公社调整为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徐州地区3364个大队,有3273个实行小队核算,取消了“三包一奖”,大队下放调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权力,不再搞大队一级的分配方案。但全区仍有91个大队继续实行大队核算,成为人民公社内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设队委会,由干部、专业人员、作业组长和个别老农组成。生产队设正副队长、会计、保管员。

人民公社初建时期,生产小队仅是公社的基层劳动组织,承包生产大队发包的“三包一奖”,使用相对固定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经营承包农田的从种到收的生产任务,兼营本队的林牧渔副业生产,指导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实行小队基本核算后,生产小队成为本队生产生活的组织单位,确定土地归生产小队使用30年不变(后改为无限期),生产队拥有本队劳动力的管理和使用权,耕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按规定完成国家的税收和征购、派购任务,上交人民公社和大队的提留。以

生产队为单位收益分配。

成立人民公社时,全地区生产小队 24695 个,在改变核算单位过程中,作了较大范围的调整,达 28074 个,以后又逐年部分划小。

(三)

人民公社刚建立时,实行军事化管理,大兵团作战,“敞开肚皮吃饭。”那时吃饭不要钱,一时间,各人民公社食堂纷纷兴起。到 1958 年 11 月中旬,全地区已办各类公共食堂 21499 所,最高峰时达 25063 所,在食堂就餐的有 474.8 万人。

1、公社食堂

以人民公社(乡政府)机关食堂为基础,与社直企事业单位食堂合并而成。

就餐人员:人民公社机关干部、工商企事业人员、学校教职员、非农业人员等。

经营方式:不讲核算,有工资收入的人员,按定额交粮票和少量现金。无工资收入和农业人员吃饭不要钱,吃饭定时不定量。

粮款来源:粮食包括国家供给吃商品粮的计划部分,不足部分从各大队调入。蔬菜粗菜从各大队调入,商品菜的菜金从公社经费、脱产人员交纳的伙食费、工商企业提取,不足部分从各大队筹集。

2、大队食堂

就餐人员：本大队的管理人员，从事大队集体生产的社员、小学教师、商业代销点、服务性行业（敬老院、托儿所、缝纫组、卫生室）人员及流动人员。

经营方式：吃饭定时不定量，不收钱，无核算。

粮款来源：本大队直接从事的农业收入和工副业收入，生产队的上交，不足部分从生产队调进。

3、生产队食堂

就餐人员：本队所有社员群众，不分工种和男女老幼一律在食堂就餐。社员来往的亲戚朋友、流动人员也在食堂就餐。

经营方式：开始不定量、不记名、不记帐，不允许社员家庭自炊。1959年春季改为定量，按人头发给，后又改为按大小口定量发票，凭票领取，节余自己，不够不补。4～5月份起，粮款紧缺，部分生产队改为农忙食堂，允许社员从食堂领饭回家自炊。

粮款来源：本生产队的生产粮、原高级社的储备粮（需经公社批准），困难队由公社大队拨给的调剂粮、国家返销粮、救济粮等。现金由生产队自筹，蔬菜由生产队自种自食，不足部分“低标准、瓜菜代”。

4、其他食堂

1958年11月份，在人民公社三级食堂之外，还办了一些专业食堂。全地区专业食堂中的幼儿食堂656所，小学食堂574所，老人食堂593所，有的大队还办起了病号食堂，主要为当时浮肿病人所设。这些食堂粮款均由

生产队供给。1959年春,由于生产队粮食紧张,均先后停办,并入生产队食堂就餐。

5、公共食堂的整顿和终止

进入1959年春季,人民公社的各级食堂弊端百出,社员不满,各级先后开始整顿,表彰节约用粮、善于调剂生活安排得当的食堂,推广瓜菜代,批评纠正办得不好的食堂,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砍掉一些专业食堂,公社机关和驻地的非农业人员实行自炊,社员中的老弱病残也允许自炊。经过整顿,生产队食堂办得好的有11528所,有4025所转为农忙食堂。

公共食堂经过多次整顿,到1961年,证明确实不利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严重妨碍社员生活,许多矛盾和困难无法克服,社员群众不满,干部信心日益降低。年底,中共徐州地委发出通知,各地食堂可以暂停,粮食发给社员,让社员过一个温暖的冬季和春节。1962年春节后,绝大部分食堂不再恢复。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的徐州地区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全面结束。

(四)

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投入大炼钢铁、大搞农田水利、大搞平田整地、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养猪场、养鸡场、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各种“大办”交织在一起,各项“大办”都向生产队伸手要劳力、不计报酬,这股

风越刮越烈,很快形成了一种对集体经济和社员家庭十分大的冲击波。这股风,后来被称为“五风”,即: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也叫一平二调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1961年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五风”期间,徐州地区区平调集体和社员的铁锅、鏊子等生活用具431.4万件,生产用具300多万件,耕畜9311头,土地57.5万亩,成材树折合木材73359立方米,无偿占用劳力2453万个劳动日,平调房屋24.5万间、(猪、羊、鸡、鸭、粮、菜、树苗等无法计算),总共折合人民币16957.8万元。瞎指挥造成的损失达5564万元。

在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和“十二条”时,中共徐州地委和各县、市委等连续对“五风”作了认真的检讨和批判,并责成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彻底退赔。大股的“五风”刹住了,但没有根绝,直到实行生产队核算才基本停止。

(文中数据来源于《徐州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志》等资料)

难忘华山岁月

周嵩山

华山县是1949年我军东进时，在丰县、铜山、肖县、砀山交界地区，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建立的一个新县，辖毛楼、陈楼、宋楼、梁寨、李寨、高寨、周寨七个区，共25万人口。于1953年1月建立徐州地区后撤销，历时八载。解放初期，我曾在该县工作四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所经历过的人和事，情和景，仍记忆犹新，宛如昨日，难以忘怀。

(一)

我是1949年3月初到华山县李寨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在这之前，我曾考取华东军政大学徐州分校，当时求学心切，很想上“华大”。李寨区委书记刘洪恩，在地下党时期与我父亲熟悉，他常到我家来，对我讲些革命道理，还拿《人民日报》（当时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冀鲁豫日报》（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给我看。他对我说，华东军政大学不同于国民党的学校，训练几个月都要分配工作，现在区里需要人，不如到区里来。听了他的话，就没有去“华大”。

我到区里报到时，是副区长孙永霁给我谈的话，叫我做文书兼事务长。刚参加工作，热情很高，叫干啥干啥，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中学生，区里同志多数是工农干部，就是有点文化的也是自学的，我的中学文化程度在当时就是“鹤立鸡群”了。孙区长与我谈话时，鼓励一番，还在我笔记本上写了几句话，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革命前程远大，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他还对我说，共产党用人讲平等，你只要有能力，现在做文书，将来就可能做区长……我听后一惊，哪有这个奢望，当个文书已很满足，也很光彩了。

当时，区委、区政府驻前孙寨村孙姓地主家，堂屋他们住，东西厢房区里人住，三间南屋作厨房。区里的人也很少。当时区委叫分委，参加分委的就三个人，分委书记刘洪恩、副区长孙永霁、武委会主任张传璧，他们三个人各带一个通讯员跟着活动。下边设南北两个工作组，各有工作员四、五人，书记、武委会主任在两个组工作，经常到区里碰头。区政府还有杨恭仁、蒋复生两个财粮、生产助理员，一个民政干事裴登沅分管区中队的工作，还有一个临时帮助收粮的陈书香。我去后不久，又新参加一位文教干事，叫徐战南，他是师范生。我们两个就是区里的文化人了。

我在区里做文书，工作量大的就是代区长写介绍信或写路条什么的，帮助上下左右联系工作。每给一个单位写信，都要先署区长的名字，使对方知道是哪个区的。

写信简单明了就行，等因奉此的陈词滥调一概没有。信尾上是党员的就写“此致布礼”，其他就写“此致敬礼”。写信也不用信封，把信纸叠成长条、方块或三角，写上收信人单位和姓名。这样做我也觉得很新鲜。因为我还兼做事务长，要经常到李寨街上去买菜，搞好区机关的伙食，同时还管着两个组的经费，要经常到县财政科去领给养。那时县委、县政府驻在戴套楼天主教堂内，我从区到县要穿过大沙河最宽的一段沙滩。这里是过去最有名的穷地方，很荒凉，大马子（土匪）多，曾有一个民谣：“夹河、临洮府，食城、包家庄，雁过拔毛。”我每走一次都是风沙弥漫，有时刮得睁不开眼睛。李口村周围，几乎看不到绿色，这给我留下的印象特深。

没有工作时就学习，主要是学习毛主席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时候还跟孙区长下村了解情况，帮助开村民会，学着讲话。虽然是个学生，但在众多村民面前有时还讲不出话来。孙区长是单县人，教过小学，很会做群众工作。他笑口常开，能言善讲，个头虽小，声音洪亮，群众爱听他讲话。每逢有群众参军时，区里组织欢送，戴红花，骑大马，吹锁呐，热闹非凡，孙区长亲自给扶蹬牵马，使参军者感到无尚光荣，这在当时影响很大。

解放初期，收缴枪支、清剿土匪的任务很重，区里工作人员都配有枪支。书记、区长、武委会主任、财粮助理员配短枪，其他人员都配长枪。给我配的是一支日本三

八式大盖子枪，口很轻，打起来声音清脆、好听，我很高兴，经常擦得锃亮，出门就扛着。这年夏季是发的灰军装，冬季发的是黄军装，穿起军装扛起枪，大家一起走出来执行任务，也觉得挺威武，精神是很饱满的。由于我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加上我又动员我的好友刘守信参加工作，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分委的同志就把我作为建党对象。

(二)

1949年4月25日，由孙永霭、蒋复生二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是秘密的，区里干部谁是党员都不知道，通讯员武奉明是党员就出乎我的意料。在我入党前，孙永霭同志先教我唱国际歌，又给我看了当时的党章，我兴奋极了，一口气看完。他征求我对入党的看法时，我表示了强烈的愿望，我将革命到底，永不叛党。没过几天，他叫我填了一张表，介绍人就是他和蒋复生同志。4月25日，区分委批准我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当时没有举行入党仪式，只是通知我参加党小组会。开小组会是一周一次，从不间断，地点大多是在前孙寨村后的大堤上，因是秘密活动，多在晚间。小组会的内容主要是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之间交换意见，“无话不可对党言”。大家有啥说啥，坦诚直爽，团结的气氛很浓。小组会上讲的事情还不准向外透露，保密性、纪律性很强。